

賽先生、德先生的轉形

● 郭穎頤

如眾所知，科學和民主以人形出現是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首先定名的。在另一處，他說過近代文明的出源地是實驗室和監牢。實驗室是科學工作地，因此是思想革命的本家。監牢是政治犯的扣留處，因此可以醞釀民主的產生，導致政治革命。當時這個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已經是40歲的人了。可是他以青年的態度在1915-1919年的《新青年》雜誌上不斷地發表了他對近代文明看重的論文，鼓吹近代文明的必要和必然。當然，首先推動新文化的欣賞應該是二十世紀初期的梁啟超和嚴復。可是把新文化推廣為運動的要算是陳獨秀和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及其同類的新文化刊物。同時，受過他刺激的青年和羣眾當然也是推動力之一。因此，在文化與思想史上來看，五四與新文化應當是可以對換的名詞。

科學與民主是今天討論文化變遷中的兩個價值符號。同時我們也可以探討一下這兩個符號如何隨着文化變動的急流而轉變它們自己的形狀。這類的轉變應該對中國近代史在意義上有所指示。

當嚴復與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看好近代文明的時候，他們也同時指出西方近代文明強盛的原因。1895年嚴復的〈論世變之亟〉一文中就提出近代文明強盛的原因：「不外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當時，科學的含義就是「真」、民主的含義即是「公」還沒有成為口號。梁啟超稱民主為「羣」，也沒有成為口號。到了新文化時期，這兩個名稱變成整個新思潮的標號。它們代表了新文化向舊文化（就是胡適所謂的孔家店）展開了二十世紀的攻勢。這兩位先生是給請來打孔家店的。但是，此類的攻擊以後來人的眼光來看是反面性的，因為它只是破壞。孔家店是給打爛了，破壞總要比建造容易一些。陳獨秀和吳虞是有名的打手，魯迅也不遜色。孔家店的聲譽建於兩千多年的儒家制度與思想，經過七十年的內亂外禍，這個儒家體制已經動搖了。可

科學本來是文化的產物，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崇拜潮流中，它大有代替文化的姿態了。



圖 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首先為賽先生和德先生定名。



是，科學與民主無論在制度上抑或在思想上在中國的基礎仍很淺薄，它們的正面含義不一定得知於眾。賽先生，因為它擁有新知識，給請來興國理才。德先生，因為它治國有方，而且大眾都可以來參與政治，給請來經國惠民。這兩種工作，在當時情況下是有急切必要的。那麼，在如此的熱流中，他兩先生的真面貌又是怎樣的呢？

唯科學主義

賽先生很快就以唯科學主義（scientism）姿態現身。有關唯科學主義本人已經有專書出版，在此不必詳述，於此僅引出幾個重點討論。唯科學主義是一種崇拜，科學的權威吸引了不少有文化以及有思想的人們。因此，崇拜他的不一定是科學家，而多半是關心文化去向的人士。它們在鼓吹科學中往往宣播了自我的新人生觀，受過科學洗禮的人生觀。當時（1920年初期）的一個統計曾經列出456種人生觀。唯科學主義極其崇拜的是科學方法，認為它是萬能的。這觀點不外就是由牛頓的宇宙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結合起來的。科學方法本身是從觀察開始，經過假設，試驗，又回到觀察，再經試驗才下判決。整個方法過程是客觀的、有次序的求證方法，沒有甚麼神秘。此類方法是實驗室的方法，最適宜實驗室的運用，它的可靠性受控制條件支配。但是，在非科學家手中，並且在人類世界環境中，它也被視為萬能良方來針對反覆無常的人類世界。這豈不是比原來的科學方法更萬能了？這些文化大夫（知識分子），如陳獨秀、吳稚暉、任卓宣、胡適、丁文江、唐鉞等，皆參入了鼓吹。牛頓用此法證實了宇宙是物質的，有量有度，可用公條法則就可證明其真相。達爾文用此法推論了人類發展的公則。中國新文化也認為宇宙內一切均可以此法來解說，

科學本來是文化的產物，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崇拜潮流中，它大有代替文化的姿態了。

並希望透過這個客觀方法，文化本身也可以客觀化。故此，科學本來是文化的產物，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崇拜潮流中，它大有代替文化的姿態了。

這時期對科學的認識只不過是十七世紀牛頓的自然法則，加上十八世紀的唯物哲學以及十九世紀的物質一元論和前進觀。在二十世紀初的X光及相對論尚未深入文化人物的知識範圍，甚至於現在，普通人也許仍舊在這一點上閉塞。這唯科學主義，假定宇宙一切確實的都是物質，物與物之間的關係、活動皆可以科學方法來研究，可以以科學公式來代表，人也是物質之一，受自然法則支配，人的靈魂作用只不過是物質的活動而已。這是信條，其成爲信條足見於科學在文化界的權威地位，成爲新宗教、新偶像。教條與信條與法則皆成爲同等詞。

在這影響之下，十九世紀的孔德與馬克思也鼓吹了科學的社會學——即社會唯科學主義。他們，連後來的陳獨秀等，都變爲了社會的科學家，中國近代史上的社會史分期與社會性質的討論是例（二千年爲過渡！）。社會主義也好，民族也好，民主也好，皆自稱爲科學的！

唯民主義

然而德先生的命運又怎樣呢？比起賽先生，稍爲不順運些。他的面貌也一直不太清楚，命運頗多起伏。科學是不受國家界限的，民主卻非但是分國線的，而且受歷史這個望遠鏡的作弄。當時，這鏡筒裏出現了不僅近三百年的民主進展，並且又照出了古代的柏拉圖，中世紀的封建。拿這望遠鏡的人自己有五千年的歷史，能一下拋棄嗎？故此，德先生是萬花筒裏的一幅相。嚴復起初把它看成是私的對面，「公」，帶有公德的意思。辛亥革命帶進了民主的口號。共和即是民主。而民主成爲了紙上物，與紙上的憲法同一條命運的！袁世凱和後來的軍閥對民主的看待就可以爲證了。

當時民主，與科學一般，不外是十七世紀的個人主義，人權思想，自由主義的結合品。其理論基礎是盧梭的眾人意志（general will）及英國功利主義。當時由梁啟超到陳與胡都認爲個人自由與社會平等並不矛盾，個人的發展會引致平等。同時期，陳獨秀可以一面推崇個人自由，一面歌頌法蘭西民族所貢獻給文明的經濟和社會平等。

1919年確是一轉折點，不論從理論和實踐而言，民主在中國已開始以新的面目出現。確實，胡適等人仍在鼓吹提倡，不遺餘力，更多的中國人仍在上下求索，如飢似渴。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而不是個人主義要旨，已經佔盡上風。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裏僅舉數例：弱不禁風的國家，呼聲四起的民族主義，蘇聯扮演的反帝角色，第三共產國際的組織壓力，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和家長作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的精神崩潰，鏟除軍閥統治的迫切需要以及西方戰後經濟，諸如此類。1919年以後，每當民主被提及，他都肩負着爲其他主義或思想意識作宣傳和公關的責任。至於願意爲民主，使民主制度化而進行自覺反思和努力的人寥若晨星。而紙上談兵，空喊民主口號之輩不乏

1919年確是一轉折點，不論從理論和實踐而言，民主在中國已開始以新的面目出現。

其人，致使出現講多於做的現象。民主者，民重於主也！在空洞的民主口號後面隱藏着更多思想意識。它們結構強大，經常為應由誰來主宰中國而爭論不休。在這種局面下，要真正牢固樹立民主精神是難乎其難的，更遑論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建立自我主宰的意識。

民主未達，一種強大的唯民主主義（populism）卻在中國問世了！唯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關係是和科學主義與科學的關係一樣的。當然，其理論更側重於民本而非民治。並且，這種思想也僅局限於知識，並非由人民自發產生。因為正是知識分子才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毛澤東也以同樣的精神把「民眾的大聯合」看作比任何改變社會的普通方法更為有利有效的法寶。之外又有李大釗的「新村」以及其他的鄉村改革建議（例如晏陽初和梁漱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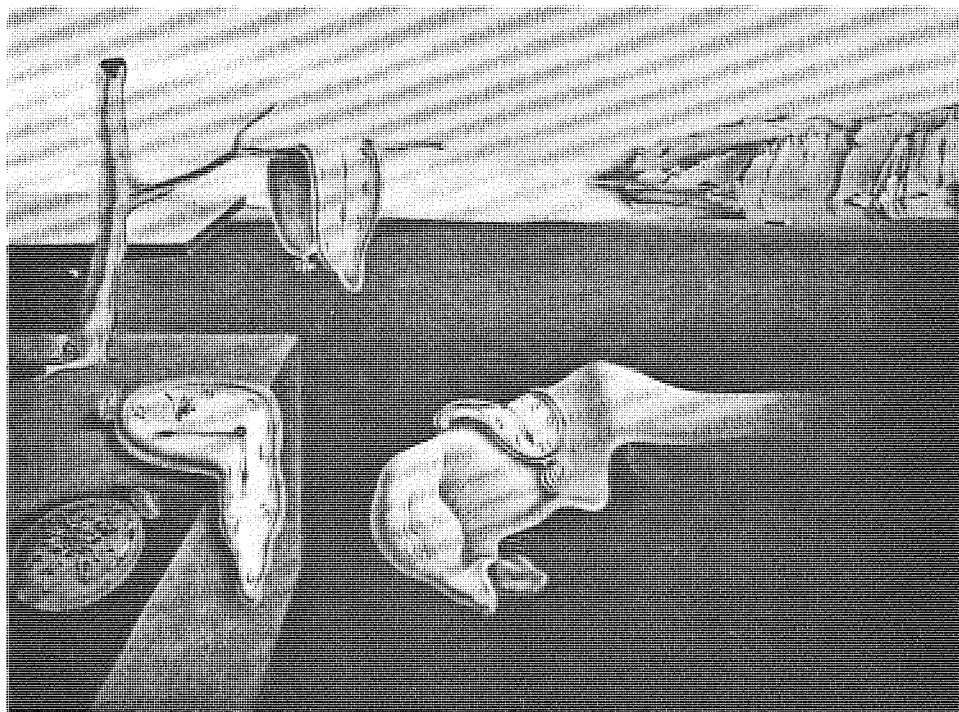
不論是俄國的「米爾」（俄國農村中的一種村社組織），或是中國人的民本思想，唯民主主義堅信一種原始的人性善。這種善存在於人民之中，被叫做「人民的意願」。這種意願高於任何生活，因為他公正而具有道德性，尤其在反覆無常的巨變中，知識界經常提及、應用這種意願。因此，這種意願形成了與社會現實相對的社會良心。社會政治生活包含公理和道德、理想和現實、渴望和社會約束之間不可彌合的差距。政治生活越複雜多變，越有可能聽到社會良心的呼聲。知識分子作為社會道德和良心的維護者，一直在尋找能容納政治意願和善行的社會儲藏！這種意願和德行不僅能衝擊歷史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裂痕，而且在革命歲月裏，還能制止鬥爭。人民又變成了彌補歷史發展的手段。而且，唯民主主義還經常被用來支持某個權威的合法性。

轉形的原因

讓我們再回到七十年前。民主與科學被人形化的事實，很容易使它們變成空洞的口號。它們本身都是舶來物（在科學方面，儘管李約瑟堅持科學是中國土生土長的），而且在中國的國土上，它們的轉形而起的作用比起它們領導西方文明而起的作用要興旺得多。這裏我並非指中國兩者皆不能（看，在科學世界裏的中國功績碑：據告知，物理學中的最新詞匯是中文的）。我的意思是說，從思想史角度來看，賽先生和德先生（順便一提，新文化中還有一位穆姑娘，Moral）表現了某些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以及現代趨勢。首先，唯科學主義和唯民主主義是錯綜複雜的思維過程的歸納。在這過程中，思想、價值和制度產生了相互的適應性。當然，這樣的歸納法很容易步入炫耀浮誇的歧途，所以經常被利用。而且，說的口頭化一些，思想推理的冗長也就被快刀斬亂麻的速決所取代。

第二點與第一點息息相關。那就是，歷史背景與中國思維方式，以及思想、主義和意識形態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暴風驟雨般的巨變後，極需盡快恢復哲學和政治機制。現在正是史無前例的價值轉化期。中國的知識分子要尋求具有權威性，受大眾支持的思想體系，已迫在眉睫。在這種病急亂投醫的情況

在中國的國土上，民主與科學轉形而起的作用，比它們領導西方文明而起的作用要興旺得多。



下，大量的思維推理和歸納出現了。尋求權威性的思想綱領有時蒙上獨裁色彩。

其三，中國傳統中一些習慣則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思想家們更注重事物的結果，而對於事物產生的原因卻不了了之。對於採納某一立場之後會出現甚麼樣的結果的爭執大大多於平心靜氣的分析探索。

對於兩位先生轉形之原因的討論先告一段落。這一對難兄難弟的前景如何？我不能預卜先知。但我意識到問題之嚴重性以及希望之所在。我認為有把握這樣說：有一天，當賽先生和德先生互通對話，發現它們彼此可以互相信賴，互相依靠時，我所說的希望就有實現之日了。說的更遠一點，穆姑娘也應積極投入到對話中來，並起同等重要的作用。只有如此，這三者才能重新振作，恢復本來面目！

郭穎頤 1932年生於上海，原籍廣東番禺。1950年赴美就讀於布朗大學，獲學士學位後到耶魯大學繼續學業，1959年獲博士學位。曾任耶魯大學、伊利諾州的Knox College講師、新加坡南洋大學客座教授。此後迄今任夏威夷大學歷史系教授並曾任亞洲研究主任、系主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等職。郭教授的學術興趣和專長在中國通史、思想史、中西文化思想比較等領域，著作《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影響很大。